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理论之声

□ 张占斌

以创新和内需“双驱动”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肖红春 王宁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重要内容,并就“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部署。这样的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既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也是实事求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兼顾了需要和可能,有利于在工作中积极稳妥把握,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向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懈努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要看到当前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比如,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领域存在诸多短板等。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就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同时,也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顺应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要求,向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个目标奋力前进。

(二)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是一个逐步实现目标的历史过程。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应该看到,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我们必然要经历先富带后富等阶段,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此进程中,要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特别是要着力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关键是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当前,我国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唯此才能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

还要看到,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任何事业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要把蛋糕做大,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要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要牢固树立共享发展的理念,需持续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三)

面向未来,更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需运用系统思维,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重点突破,具体在以下几个方面切实发力:一是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十三五”时期,我国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脱贫攻坚战打赢之后,我国摆脱了绝对贫困,但解决相对贫困的任务依然艰巨。要接续推进已脱贫地区的发展,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保持财政投入力度总体稳定,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特别是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二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当今世界,核心技术、高端科技就是现代的“国之利器”,谁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长远发展的巨大优势。未来5年乃至15年,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找准我国科技发展应走的路径,朝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顽瘴痼疾“开刀”,让科技力量在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上充分显现,激发科技创新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作用。

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更加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通过一系列重要举措,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

本版责编 栾笑语

需战略,使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推动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从需求上看,我国拥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增长空间。从供给上看,我国拥有基于国内大市场形成的强大生产能力,能够促进全球要素资源整合,使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总体来看,面向“十四五”时期,我们需推动实现“创新驱动”和“内需驱动”,并以此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下一阶段,需围绕深化改革,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改革关键一招的重要作用。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环境;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重要作用;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要深化农村改革,积极解决“三农”问题,为实现共同富裕夯实根基。同时,还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特别是要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更多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

为此,我们要着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将突破一系列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的根本出路和动力放在创新上,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要明晰主攻方向,找准我国科技发展现状和应走的路径,把发展需要和现实能力、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统筹起来考虑,重点是将现存的“卡脖子”环节逐个攻克。同时,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创新营造良好环境、提供基础条件、搞好相关服务,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还要加强创新人才培养,力争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二、扩大内需是进一步激发经济活力、积蓄发展动能、对冲世界经济下行风险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进出口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小。改革开放后,我们打开了国门,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可以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节点。面对严重的外部危机冲击,我们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国内循环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开始显著上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实施扩大内

强“创新驱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另一方面,加强“内需驱动”,注重需求侧管理,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畅通国内大循环。同时,也要加深对“创新驱动”和“内需驱动”的认识,激发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科技实力直接关系到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创新,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在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和影响愈发凸显,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成为发展速度、质量、效能等的决定因素,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动力支撑。

当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创新能力依然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一些高端核心技术缺失,存在“卡脖子”问题;一些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高新技术领域发展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可以说,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从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也是换不来的,在引进高新技术上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走

提高而不断被压缩。

孙志燕

郑江淮

二是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导致区域间功能分工碎片化趋势加剧,价值链的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的竞争呈现出新态势。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数字化直接表现为不同功能的模块化和标准化,这就为分布于不同地理空间的功能实现互联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低端分工环节在地理空间上的迁移成本。价值链的发送者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细化整个价值链的功能分工,实现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的分工组合。

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在空间上的分散化,不仅导致企业间的横向竞争加剧,而且这一态势沿着供应链向上下游传导,使价值链垂直分工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在加剧,增值收益进一步流向价值链中具有垄断地位的主导企业。

三是全球价值链数字化的网络集聚效应推动“经济增值”分配机制发生变化,进一步强化领先企业的垄断趋势。

全球价值链数字化最具变革性的影响之一是“服务”的数字化,即传统上不可贸易或者具有地域属性的“服务”转变成几乎不受地理区位限制的可贸易产品。需要看到,全球价值链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对处在不同分工环节的国家和企业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一方面,电子商务、线上支付、数字化平台等新的商业模式进一步强化了高收入国家和全球领先企业的先发优势。另一方面,由于在数字技术的价值链中,要素和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发生变化,领先企业利用自身网络垄断的数据资源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更精准地定价,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市场需求与生产地的优化匹配,能在事实上控制全球价值链的定价权。而处在价值链中低端生产制造环节的企业将同时受到来自上下游的挤压——上游企业的技术、品牌制约和下游的价格竞争,其增值空间将随着数字化水平

的提高而不断被压缩。

充分发挥既有优势有效应对挑战

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不仅改变了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区位选择,也改变了经济活动“增值”的来源和分配机制,在更大程度上强化了技术策源地和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面对诸多挑战,我国要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关键在于有效提升技术能力和创新经济增长路径,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

第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的融合,构筑更专业化的竞争优势。

我国应及时调整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的方向,聚焦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以及技术深度较高、产业链相对较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整合集中优势资源构建更加专业化的技术优势。可考虑减少一般性的产业政策,以“功能升级”为导向推动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的融合,推动关键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功能升级实现根本性突破。

第二,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加大对需求侧的政策支持力度,以发展中间产品为重点推动全产业链的功能升级。

高技术产品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是我国攀升价值链中高端面临的重要制约因素。一方面,技术密集型的新产品由于前期较高的研发成本形成了较高的市场价格,市场需求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新产品的使用往往需要配套支持性产品的更新,新一代技术迭代周期又相对较短,综合使用成本相对较高,这同样影响了有效市场需求的释放。对此,可考虑实施更积极的需求侧政策,通过税收减免、税前抵扣、技术标准等政策工具,为

积极应对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的挑战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梁泳梅 提出:

多措并举促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

补短板、强弱项,更好实现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在政策层面给予多方面的有力支持,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

一是加强研发投入力度。需要从整体上增加研发投入总量,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的研发投入。同时,通过多元化方式为企业主动增加研发投入提供支持,鼓励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比如,可考虑对企业研发投入资金给予税收优惠,并引进风险投资基金,将社会资金有效转化为企业的研发投入。

二是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传统产业优化

升级,既需要科研人才,也需要高技能人才(主要包括技能劳动者中取得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人员)。在科研人才的保障方面,应建立灵活的科研人才管理机制,提高人才配置效能,创新人才激励机制,通过项目补助、平台资助、人才奖励等方式激发科研人才的创造力。此外,对于传统制造业而言,要更重视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针对高技能人才尤其是青年高技能人才短缺的现状,需着力完善技术工人培养、使用、评价、激励、保障等方面的措施,推动技工院校改革,增加对技工院校经费支持;通过税收补贴、专项补助等方式鼓励企

业积极培育高技能人才,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培育更多企业需要的定向技能人才;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形成职业学校和企业之间良性互动的技能人才培训机制。

三是不断提升产品标准体系。要强化环境保护管理,进一步提高治理标准,完善污染物排放监测,推动绿色发展;还要强化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既着力于提高产品质量,又着力于优化产业链分工,打造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新优势,提升我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话语权和竞争力。

撷英

(肖伟)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全球经济活动组织模式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加速演进,从研发、制造直至最终消费等价值链不同环节的数字化水平显著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功能模块化和碎片化趋势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则利用其在新一代技术领域的优势,试图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垄断地位。

在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和发达国家技术垄断趋势持续加强的背景下,我国不断向价值链更高端攀升,面临着诸多挑战。对此,需深入分析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有效应对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挑战。

深入研判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的新趋势

当前,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方兴未艾,呈现出以下几方面新趋势。

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优势在价值链数字化转型中被进一步强化,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追赶的难度加大。

与上一轮科技革命相比,以信息网络为主导的新一代技术本质上属于分层技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应用技术都是基于底层技术来实现的,这就为拥有底层技术的策源地创造了更大的垄断性的技术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新一代技术相对于传统技术而言,不仅迭代更新的周期更短,而且具有强大的网络特性,一旦更新,尤其是底层技术实现升级,就意味着上一代技术和相关的应用技术都可能被替代甚至退出市场,不会像传统技术那样进入成熟周期后可以向其他国家梯度转移。正是由于这种技术范式的改变,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已很难如传统工业化时期那样,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技术进行适应性改进和创新来实现本国的技术升级和追赶。

“十三五”时期,我国传统制造业在优化升级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绿色生产步伐加快,生产更加节能环保;持续淘汰落后产能,产品不断向“高端化”推进;研发投入增长较快,新产品不断涌现;“智能生产”也初现雏形。但与此同时,传统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仍然较弱,创新环境尚需改善,低成本优势也在逐渐减弱。

需要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更为迫切,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这些都对更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传统制造业需抓住机遇,把自主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积极